

## 臺灣文學與文獻中「打狗」港灣符號的 衍異與層構（1624—1920）<sup>i</sup>

吳毓琪<sup>ii</sup>

### 摘要

本文欲從 1624 到 1920 年間臺灣文學作品與文獻史料逆溯，打狗港自原始住民馬卡道族，再經過荷蘭人、鄭氏與清治的漢人、日本統治者等不同族群如何對此港灣的建築經營與文化營造。不同族群文化所投射與積澱的不同文化意識與概念，形塑出打狗港的不同文化內涵，層層的文化養料也造就了今日具現代化港市規模的高雄港。此南臺灣海岸的代表性港口——打狗港，自十六世紀起，經由不同族群、不同統治者對此港功能的開發營造，從漁鹽之利至貿易經商，打狗港灣的功能歷經不同時間沈積了不同的文化意涵，為求層層梳理各積累於此港灣的文化內涵，本文中筆者採徵引語言符號學的「歷時性」觀點考察「打狗」、「打鼓」到「高雄」港灣符號的概念演變，探討此地文化層次建構的歷程，並探究「打狗」的海洋港灣文化如何逐層呈現。

**關鍵詞:**Takao、打狗、打鼓、高雄、港灣符號、海洋港灣文化

---

<sup>i</sup>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修改意見，獲益良多，謹致謝忱。論文初稿宣讀於「城市與海洋：都會、移民、記憶與想像」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2010年10月16日至17日。

<sup>ii</sup>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 **The Semiotic Derivation and Stratum Structure of “Takao” Harbor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archives ( 1624—1920 )**

**Wu, Yui-Chi\***

## **Abstract**

By retracing Taiwanese literary works and historical archives between 1624-1920,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from the aboriginals of the Makatau tribe and the Dutch to the Han of the Zheng Cheng-Gong regime and the Qing Dynasty and Japanese rulers) had cultivated Takao Harbor’s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 The culture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reflects varying kinds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onception which created the uniqu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akao Harbor. Layers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also underlie today’s modern Kaohsiung Harbor. Starting from the 16<sup>th</sup> century, Takao Harbor, the representative port on the southern coast of Taiwan, had undergone development and cultivation by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rulers. From a port engaged in the fishery and salt businesses to a prosperous site for businesses trading, Takao Harbor had gone through a series of different cultures in various time periods. In order to sort out the various cultural connotation accumulated in the harbor over time,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has investigated the conception evolution of the Harbor’s name from “Takao” and “Tagu” to “Kaohsiu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and explored the track of the place’s cultural layer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how its marine and harbor culture i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presented, layer by layer.

**Keywords: Takao, Tagu, Kaohsiung, Name of The Harbor, culture of the Harbor**

## 一、前言

臺灣是西太平洋上的一個島嶼，海島的地緣條件、海岸港口、交通網絡、商業經貿、渡海移民等諸多歷史因素，形構出臺灣海洋文化的特質，且因臺灣島上多港口，「海港」開放性地理條件，為臺灣文化引進各樣養份，形成臺灣島民具有多元吸收與包容的海洋性格。港灣是具有天然掩護或人工措施，可停泊船隻的海灣，它是海洋向陸地靠泊的首要接觸點。當外來文化隨著海洋浪潮推向陸地、登上陸地時，陸地原有的人文生態，亦隨之產生變化，其最明顯的變化點即是在海岸的港灣上。港灣受到不同時刻、不同文化浪潮的衝擊，一層層的文化累積，多元層次的文化意義亦逐步構築在港灣符號上。

1920年日本總督府改革地方制度，是年之後，高雄州亦正式設立。本文採取追本溯源的思惟，追溯高雄州設立之前，位於南臺灣海岸的打狗港之文化層構歷程。自十七世紀起，不同族群、不同統治者對此地的經營與開發，從漁鹽之利至貿易經商，打狗港灣的功能歷經不同時間沈積了不同的文化意涵，以形成現今港灣風貌。

目前學界研究打狗港的視角多從港埠機能、產業經濟等面向來探討，如：吳雅芳《打狗港與旗後的發展（1624-1920）》<sup>1</sup>探討打狗港的生成背景、漁產資源、商貿潛力、及港口機能等；洪啟文，《高雄港市聚落的形成、擴展與互動發展（1924—2004）》<sup>2</sup>，從清領前到民國時期港市聚落的歷史發展進程。另有以文獻史料的角度來探討者則多歷史學者，如張守真〈明鄭時期打狗史事初探〉<sup>3</sup>、葉振輝，〈打狗軼聞〉<sup>4</sup>等文以史事記載來保存打狗港的文化記憶，相關研究打狗港多鎖定在社會歷史層面。有一篇相關的文學研究，則是以日治時發展於打

<sup>1</sup> 吳雅芳，《打狗港與旗後的發展（1624-1920）》（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sup>2</sup> 洪啟文，《高雄港市聚落的形成、擴展與互動發展（1924—2004）》（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地學所博士論文，2007）。

<sup>3</sup> 張守真，〈明鄭時期打狗史事初探〉，《高雄文獻》32、33期合刊（高雄：1988），1-19。

<sup>4</sup> 葉振輝，〈打狗軼聞〉，《高市文獻》4卷1期（高雄：1991），1-17。

狗港附近的「哈瑪星」為研究，楊雅惠〈西灣哈瑪星空間前史：由地誌詩學的考察〉<sup>5</sup>。筆者則希望統合臺灣文獻史料，佐以數位資料庫的應用，加上臺灣文學作品所書寫的打狗港，以時間縱軸的脈絡釐清文學與文化觀照之下的港灣形象。

本文將以追溯打狗港灣的形成歷程，發現從「打狗」、「打鼓」到「高雄」，每一稱謂詞彙的演變，皆有其特殊時空背景，換言之，各個地名符號皆蘊含著社會結構中的文化因素。十九世紀末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dana de Saussure*），主張在任何時候語言都不能離開社會事實而存在，因為它是一種符號現象，追根究底，符號背後乃與約定俗成的社會文化相關連。語言符號的「音符」與「意符」關係將隨著時間流動有不同程度的轉移與變化<sup>6</sup>。

港灣符號為海洋文化中的語言符號，用以指稱這特定點在海洋文化的變化過程，其所具有的關鍵性意義。因此，本文採「歷時性」的考察觀點「打狗」、「打鼓」到「高雄」港灣符號的概念演變，以探討此地文化層次建構的歷程，並探究「打狗」港灣符號如何呈現於 1920 年以前臺灣文學作品與文獻史料中？打狗港灣符號如何被不同族群、不同的移民賦予不同的文化意義？不同的時間階段，打狗港灣或被植入、或被汰除了不同文化元素，並且如何層層建構成為打狗港灣獨特的文化圖象呢？筆者擬分層來闡述其對打狗港所建構的符號概念。

## 二、十七世紀荷蘭人所構築的打狗港灣符號

高雄古地名「打狗」（*Takao*），得名自於先居住此地的住民，亦是平埔族西拉雅之一系的「馬卡道族」（*Makattao*），此地先住民的部落稱為「打狗社」，原指竹林的意思，「打狗」二字是漢字音譯寫法，據日人伊能嘉矩考究：「鳳山縣下淡水流域，平埔番馬卡道族，屬西拉雅族，所屬阿猴社，原稱打狗社，佔居

<sup>5</sup> 此文收錄於王儀君主編，《哈瑪星文化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中心出版，2012）。

<sup>6</sup> 索緒爾（*Fedana de Saussure*）著，高名凱譯，《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符號的不變性與不可變性〉，頁 116。

打狗港口一帶，此事有該族口碑傳承（打狗為該番語「竹林」之意，蓋因其土產而命名者）」<sup>7</sup>。

1604年10月荷蘭東印度公司派司令官韋麻郎（Wijbrand van Waerwijck）試圖到閩南開發貿易市場，中間經過磋商，在計畫即將談妥之際，同年11月18日沈有容突然來到澎湖，破壞了韋麻郎的計畫，沈有容諭退韋麻郎，並建議他到澎湖的「東南東和東南的方向」尋找合意的港灣，此時韋麻郎曾赴臺灣西南部港口，包括大員、打狗等處查<sup>8</sup>，這是目前荷蘭文獻上，最早記錄有人登陸打狗的資料，也是打狗因港埠荷蘭人的需求，首次引起外界注目的史事。

而後隨著荷蘭東印度公司於1624年正式統治臺灣，更多有關打狗港自然人文的書寫逐漸出現荷蘭文獻上，荷蘭治臺記錄《熱蘭遮城日記》即是一例，在1630年此日誌中記載打狗港為等候接泊大船或快艇入臺的地點，當時的打狗港為荷蘭人戎克船的接泊港<sup>9</sup>。

荷蘭人治臺期間，打狗港可謂大員後備港口，曾派員停駐此地，初期或許因對打狗的認識不深，1633年6月17日，一艘小戎克船去打狗附近巡戈，並等候從巴達維亞來的船隻助理及另外六人，當他們停泊於打狗灣時，因未具警戒心，全都被當地居民謀殺死亡<sup>10</sup>。當時荷蘭人對打狗環境認識不深，未加以防備，登陸時即被打狗社原住民殺害，此事一發生，使其對打狗港蒙上血腥殺戮的驚恐認知與觀感。

打狗社原住民的殺人舉動，未挫敗荷蘭人進駐此地的銳氣，1637年11月30日荷蘭長官范得堡率兵卒登上打狗，並對地形作了實地的探覬：

---

<sup>7</sup> 伊能嘉矩著，江慶林等譯，《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上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1991），頁50。

<sup>8</sup> 江樹生譯註，《荷蘭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1）》（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7），〈導言〉，頁XIX。

<sup>9</sup> 1630年6月26日「長官普特曼決議，…派一艘戎克船前往打狗（Tancoya），為要在幾個地方等候從爪哇來的大船或快艇」；同年7月17日記載：「戎克船日本號出發，要前往打狗與金獅島等候從爪哇來的大船，並去巡戈從中國要前往馬尼拉的戎克船」，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記·第1冊》（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02），頁30-31。

<sup>10</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記·第1冊》，頁80。

我們搭舢舨去察看在打狗小海灣裡的那猴山，那水深和港灣的情形，看到都與所畫的地圖所指示的相一致，即在那猴山的南邊，有個於北颶風時，公司在東印度航行的最大的船隻也能進去那後方避風的海灣，不必飄到巴達維亞去，除非故意要飄去；還去看了打狗南邊的土地和那一帶的地勢，跟所畫的那裡的地圖都互相吻合。<sup>11</sup>

探戡打狗港的水深與地形，初步掌握此地是足供大型船隻避風的港灣，可作為日後船隻避風之用。1637年日誌中對打狗港灣地形敘述略嫌簡略而含糊。

在1639年9月28日荷蘭長官范得堡再次率員前往打狗戡查，除了港灣，也對打狗港北面的猴山有詳盡描繪，可見荷蘭人對打狗的認識已增進許多，日誌中不僅詳細敘述港灣的水深、方位、地質及地形走勢，更清楚地呈現實地丈量長、寬、高的數據，打狗港灣的形象亦隨之清晰起來：

長官范得堡閣下與特使庫庫巴卡閣下以及其他朋友們，去視察打狗的情形以後，搭乘中國人的戎克船回來此地入港了。發現打狗的彎角位於北緯22度，在那石頭山的西邊海邊，該山的東邊比較平坦，並且逐漸下坡。在打狗與猴山之間有條狹窄的水道，水道兩邊都有很多礁石，在水道北邊有一個礁石露出水上，使深度為4又1/2，4和3又1/2尋的該水道更狹窄了三分之一，因此，寬度不過15roeden。那裡又有湍急的水流，所以，大的快艇和大船不能航行，因此，船隻入港時，必須在礁石那裡迴轉，以免擱淺，該淺灘位於該河道裡面東南南和東南方，在這包圍起來的海灣裡，能停泊兩三艘50到60last的快艇，而且還要在好天氣時才能進去，因為西風會使船隻擱淺。猴山很陡峭，高約30roeden，在猴山的北端上有一片平地，長13roeden，寬5roeden，在那裡造一堡壘，可防守該水道的港

<sup>11</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記·第1冊》，頁364。

外與港內，但是在北風季節時，就無法保護那兩三艘 50 到 60lasten 的快艇了，因為這時那些船會停泊在該猴山的東南方一個適當的沙灣裡，在那裡也應該造個碉堡。<sup>12</sup>

據此記錄，打狗港的具體形象已清晰可見，港灣符號的形象：兩個岬灣崎角相對，倚山而立，如天然的海洋防護灣臂，環海包圍，天氣好時可供船隻停泊，唯此地多礁石。這些打狗港灣的地理認知，在一六三九年的荷蘭人記錄中清晰可見，也具體呈現了打狗港所具有的吞吐功能，連結了形符與意符的關係。伴隨著荷蘭人對打狗港認知推進，荷蘭人興起了建造碉堡、駐兵此地的念頭，但至終未真實建造碉堡，以致未能進一步開發打狗。

打狗港除了被荷蘭人視為大員港的後備港口，亦為大員的物資補給站，據《熱蘭遮城日記》第二、三冊所載，打狗地方專門提供柴薪、鹽、魚等物資給熱蘭遮城<sup>13</sup>。

1630 年以後打狗港亦為荷蘭人收納中國漁船鰻魚（烏魚）稅的據點。臺灣西南海域，經荷蘭人掃蕩海寇後，荷蘭人遂控制了堯港至打狗港的海域，在此從事捕魚工作中國漁船向荷蘭人繳魚稅，每年 12 月左右，來自福建的魚船，先駛至大員，一、二天後再至南部的打狗、堯港、下淡水溪，進行捕魚作業，待捕魚完畢，歸航大員繳納什一稅。1646 年 12 月 17 日荷蘭長官派舵手長席梅爾滋（Sievertsz Raelaff）及十數位士兵，租中國漁船前往堯港沿岸一帶執勤，順著打狗、下淡水等地沿岸，從事檢查中國漁船之捕執照等工作，並於猿山背後設立檢查哨，作為執勤中心<sup>14</sup>。足見荷蘭人對打狗港的運用層面再擴充為魚船稅收的據點。

東印度公司在《熱蘭遮城日誌》中，對打狗地名的拼音方式，有 Tancoya、

<sup>12</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記·第 1 冊》，頁 453。

<sup>13</sup> 打狗港提供柴薪等物資給大員的記載，參見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記·第 2 冊》（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02），頁 336、343、346、369、374……；《熱蘭遮城日記·第 3 冊》（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03），頁 21、29、35、52……。

<sup>14</sup> 中村孝志著，江燦騰譯，〈台灣南部鰻魚業再論〉，《台灣風物》（1986，36：3），頁 58-60。

Taccauja，而在 1636 年荷蘭人彼得·約翰松·凡·密得堡（Pieter Jansz van Middelburg）所繪的臺灣地圖中，標注打狗地名，以「Tancoia」的記音方式，這是打狗首次在世界地圖中出現<sup>15</sup>。遲至 1664 年荷蘭人退出臺灣後的第三年，由密西爾·黑理斯松·博斯（Michiel Gerritsz Boos）繪製的臺灣地圖，乃是荷蘭人企圖再收回統治臺灣權而繪製，這張地圖中對臺灣南部的港口描繪得相當詳盡，包括打狗港亦然，圖中以 Tankouija 拼音方式，記錄了打狗地名，並視此港灣為重返臺灣的入口<sup>16</sup>。

歸結荷蘭人構築打狗港符號意義，Takao（打狗）原是「馬卡道族」語音，1624 年以後荷蘭人採用「Tancoia」「Tancoya」「Taccauja」等拼音文字，亦是以音響與形象連結此地方名稱的概念。符號任意性累積「打狗」符號的意義層，先是以記音的方式承載馬卡道語的音符，連結探勘打狗港灣地理意涵，其次，荷蘭人再賦予打狗港接泊轉運物資、漁船稅收等符號意義。

### 三、明清時期漢人文學中打鼓港灣符號所聯結的多元意旨

1661 至 1683 年這段時間，在臺灣歷史學界裡，稱之為鄭氏王權統治期，結束了荷蘭治臺的歷史，進入了漢人王權統治的階段。明鄭時期政治中心在府城（今臺南），打狗港則屬於漁港，兼具軍備要地。1662 年鄭成功病逝之後，原本敗退的荷蘭欲重返臺灣佔據，1664 年荷蘭選擇打狗港計畫再攻取臺灣，此時荷蘭人以打狗港為入口的原因：一方面可避開鄭經的主力軍隊，再方面此時的大員港已淤塞，不利大型船艦進入<sup>17</sup>；是年 2 月荷蘭特遣隊全部船艦開往打狗南岸之處集結，其軍士且登岸紮營，準備採取軍事行動，然此時鄭軍已在打狗山上置有砲

<sup>15</sup> 1636 年彼得·約翰松·凡·密得堡所繪的地圖中，可知荷蘭人已掌握打狗港的海域，《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地圖·上冊》（臺北：漢聲雜誌社，1997），頁 122。

<sup>16</sup> 1664 年荷蘭人失去臺灣的第三年，密西爾·黑理斯松·博斯乃繪製的地圖是荷蘭人企圖奪回臺灣而繪製的探勘地圖，此時荷蘭人欲從打狗登陸，此圖對打狗附近的地理標示更為詳細，除了打狗（Tankouija），亦標出猴山（Apen Bergchl）的地名。《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地圖·上冊》，頁 125。

<sup>17</sup> 1650 年時大員港淤積日漸嚴重，船隻出入大員愈來愈困難，參見《熱蘭遮城日記·第 3 冊》，頁 179。

城，至 1665 年荷蘭人受鄭軍圍堵，不得其門，無功而退<sup>18</sup>。經此過程，可知在荷蘭與鄭軍交手之際，兩方皆已看見打狗港在軍防上的重要性。進入鄭氏王權治臺的階段，打狗港區更正式成為軍屯重鎮，並隨著明清漢民移入，此港漸有漢人聚落出現。

「打狗」一詞首先出現於漢文文獻是始自 1603 年隨著沈有容來臺的陳第〈東番記〉一文，文中提及：

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島中。起魷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其居也，斷續凡千餘里。種類甚蕃，別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sup>19</sup>

相較於臺灣西南部其餘港灣，這裡以「打狗嶼」的名稱，突顯打狗港的地形特徵，陸地上突起的一座小山，小山緊連著大海，著眼於打狗的自然地理形態及其居民部落型態，這是陳第對打狗的粗略印象，也是臺灣漢文文獻中最早出現打狗文化符號的初胚。

1661 年明鄭在臺勢力結束後，臺灣進入清人統治的階段。清人治臺後，打狗港的相關書寫，已漸改為打鼓港，理由是「打狗」一詞，清人以為俗，故改以「打鼓」稱之<sup>20</sup>；再者，清人善於詩文，多取打鼓一帶雅緻的山水景象作為書寫題材，而且作品中亦多將與打鼓港緊鄰的打鼓山一併呈現，產生了山海意象結合的符號特點，此二現象下文將詳論之。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首任臺灣知府蔣毓英《臺灣府志》裡對「打狗仔港」的認知是：

打狗仔港，在觀音山庄打狗山下。其港口有巨石成一門，門甚窄，僅容

<sup>18</sup> 張守真，〈明鄭時期打狗史事初探〉，《高雄文獻》（32、33 期合刊，1988），頁 8-9。

<sup>19</sup> 沈有容，《閩海贈言》（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卷 2，頁 24。

<sup>20</sup> 朱仕玠，《小琉球漫誌》（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卷 3，頁 30。

一艦，中有港，可泊船。<sup>21</sup>

依康熙時臺灣行政劃分來看，打狗港隸屬於鳳山縣，此港有船停泊，然港口有巨石開成一門，門甚窄，僅容一隻船艦進入。

康熙五十九年（1720）刊行李丕煜主修的《鳳山縣志》描繪早年打鼓仔港灣的山海地形及周邊的軍防設施：

秀茂屹立，而特峙於大海之濱者，曰打鼓山，水師之營壘在焉。<sup>22</sup>

緊鄰著打鼓山峙立濱臨大海，與岐後山（旗後山）相對，中間所形成的港灣，即打鼓仔港，海汊港北方置有打鼓汛，港南方置有岐後汛，這兩處港汛皆設有步戰守兵，其中打鼓汛又加設把總一員，顯見打鼓港為軍防重地，總將領據守此處，轄管其他軍營<sup>23</sup>。

滿清政府之所以列打鼓港為海防之重地，係因此地海盜出沒，約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朱仕玠〈打鼓山〉提及此事：

鼓山邑右輔，百里見尻骨。猙狀類孤羆，修腳踏漲渤。茲地萃舟航，冗點時出沒。道乾昔敗衄，裒船漬番血。誰為覩縷傳，毋乃涉荒忽。森森樸材，營伍樵蘇窟。代期三年瓜，口糧隨月撥。猛性關虎哮，賴此朝夕活。<sup>24</sup>

打鼓山一帶匯集了各地舟船，海盜出沒，更是時有所聞，昔日林道乾血染打狗社居民，事敗後從打鼓港逃走的事件，對清政府而言，應加強防範外患易入之地，打鼓山多柴，茂密的樹林中，樵夫柴扉與屯兵軍營，比鄰而居。此地有水師營兵的駐守，雖屯兵三年一更換，卻是日日威猛，遠望巡視風浪呼嘯，謹防海盜出沒。

雍正六年至九年（1728 至 1731）來臺擔任巡臺御史的夏之芳，其〈臺灣紀

<sup>21</sup> 蔣毓英著，黃美娥點校，《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 152。

<sup>22</sup> 李丕煜主修，詹雅能點校，《鳳山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頁 67。

<sup>23</sup> 李丕煜主修，詹雅能點校，《鳳山縣志》，頁 126。

<sup>24</sup>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 2 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頁 394。

巡百韻〉中擬畫了打鼓山海之間，巨浪濤天、轟聲雷動的驚駭畫面，是清初臺灣古典詩書寫打鼓山與打鼓港地形的代表作：

打鼓山頭石罅開，懸崖倒拍海潮迴。雷聲鼎沸浮空翠，萬里風檣認影來。<sup>25</sup>

夏之芳由海路向陸地遠視打鼓港，山頭巨石裂縫開的形勢，浪拍潮迴，轟隆聲響如雷聲大作，湛藍的海色與青翠山巒鮮明互映，風帆點影之間，一靜一動形成打鼓港灣的意符。

打鼓山特然峙立於海濱，山下為打鼓港，千變萬化加上激浪轟隆作響，打鼓港口如門，而門外多礁石，隔海參差遠近浮沉，列於打鼓山左右者，石佛嶼及涼傘嶼，《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記載：

西有石佛，石佛之北有石墪，石佛之南有涼傘礁，皆屹立海中。舟人經此，必鳴金獻紙。<sup>26</sup>

打鼓港西有石佛嶼，石佛嶼之北有石塔嶼，南有涼傘礁，皆屹立於海中。打鼓港前礁石屹立，礁石對漁夫構成威脅，使其行經此港有一習俗，叩金鳴響及焚紙錢獻祭，以祈求平安。章甫（1760～1816，臺灣縣人）有〈遊打鼓山〉一首，由山上觀海，打鼓港附近兩突起的礁石：

千尺懸崖一隙通，長蛇盤在水流中。歸雲入洞山屏展，破浪回潮海氣空。

西望飛帆參石佛，南遊採果問仙翁。搜奇恰好三春最，四面拖藍萬點紅。<sup>27</sup>

章甫此詩「西望飛帆參石佛，南遊採果問仙翁」二句後註記：「志云：西有石佛，舟人經此，鳴金、焚紙錢」，打鼓港外多暗礁，觸礁的危險成為清治時漢人對打鼓港灣符號的認知。

<sup>25</sup>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2冊》，頁103。

<sup>26</sup> 劉良璧纂輯，楊永彬點校，《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頁127。

<sup>27</sup>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臺北：宗青圖書公司，1995），頁460。

上述夏之芳詩中指出打鼓港帆影多為漁船，此地漁產資源豐富，遠自荷蘭治臺期間曾在此海域收受漁獲稅，歷經明鄭、到清治時期，打鼓山及其西南旗後山的附近港灣地帶是漁船出沒地方，漁人在此採收烏魚。臺灣烏魚之味美，經濟價值高，為清政府增加稅收來源，乾隆年間來臺的范咸〈烏魚〉一詩為證：「網魚競捕正頭烏，興味頗嫌至後殊。海堀引回憐瘦劇，船頭懸罟急征輸。」<sup>28</sup>打鼓港的烏魚船夫捕捉烏魚時，需向清政府官員領取烏魚旗，使得被允許採捕。於是，豐收烏魚的經濟意義亦成為打鼓港另一符號層次。

多少騷人墨客駐立打鼓山，遠望與旗後山對立生成的天然港灣：打鼓門，聽聞海潮擊岸、怒濤湧入，以「門」的概念衍生港灣符號的另一意旨。宋永清於1704年來臺任鳳山縣令，當時所寫的〈打鼓山〉詩中：「縱觀魚躍硫磺水，諦聽潮來打鼓門。偏是怒濤風雨後，赤鱗金甲吼乾坤」<sup>29</sup>，立足於青翠綠蔭，枝桠交錯的縫隙中，萬頃碧波，一旦狂風驟雨，打鼓港岸邊怒濤激起的景象，迥然不同於風平浪靜時，魚躍硫磺水、潮來打鼓門的和諧畫面。海洋景象千變萬化，詩人捕捉的港灣形象，注入了聽覺的驚駭與視覺的多變的感受。打鼓門的多變景象，本土詩人亦有同感，在乾隆五十年的鳳山縣歲貢生柯汝賢作〈鼓門夜泛〉一首，寫海象之多變：

打鼓門中泛，紆迴水兩歧。平湖山倒影，古樹鳥啼枝。灣曲風多換，嶺高月出遲。雞聲泉落峽，龍睡客探驪。瞬息譙樓近，峻嶒古剎危。幾曾滄海望，氣象萬千時！<sup>30</sup>

打鼓門為船舟進入打鼓港之入口，此處多暗礁，船隻航行入港，紆迴繞道，作者註明打鼓門中有絕險之雞心礁分流。風平浪靜時，湖山倒影，樹鳥啼枝。曲灣多風，高嶺觀月。瞬息間，峻嶒高山起伏不平，望臺近、古剎危，山海變色，滄海

<sup>28</sup> 范咸此詩有「引」以補充說明烏魚的產季及徵稅方式。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2冊》，頁265。

<sup>29</sup>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1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頁353。

<sup>30</sup> 王瑛曾編，《重修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444。

桑田，千變萬化！

打鼓山觀海，亦有平靜無風的時候，詩人體味到萬變中的不變，時間剎時停止，林紹裕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任鳳山縣學訓導，有作〈重九後一日登鼓山觀海〉：

重陽宿酒未曾醒，又載樽壘絕島停。滄海無風長澹煙，遙天竟日自青冥。

飛飛沙鳥紛如葉，點點漁舫宛似萍。最愛綺霞明夕照，乾坤橫展畫圖屏。<sup>31</sup>

滄海無風，澹澹雲煙，秋後打鼓港外海面平靜異常，「竟日」海天連成一線，飛鳥、漁船如葉似萍點綴其中，徐徐和風，詩人不禁以「最愛」之詞直接表露情感，此幅乾坤夕照之綺霞畫屏以明亮風格，映照著審美者愉悅心情。

打鼓港灣山海景致，湛藍與翠綠的鮮明色澤環繞，隨著詩人移步登履，每一視角、每一景點，逐題吟詠，生長於鳳山縣的卓肇昌，立足於打鼓山開展視角，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高或低，擇取山景海景，題寫〈鼓山八景〉，呈現出打鼓山與港灣海域的多元層次立體圖像，「秀峰插漢」、「石佛凌波」、「雞嶼夜帆」、「斜灣樵唱」、「元興寺鐘」、「石塔垂綸」、「旂濱漁火」、「龍井甘泉」。其中「石佛凌波」、「雞嶼夜帆」、「斜灣樵唱」、「石塔垂綸」、「旂濱漁火」即關連著打鼓港及周邊海景的書寫，如海中巨石的書寫，則有：「石佛凌波」，石佛嶼在鼓山西，屹峙海中，其狀如石佛；「石塔垂綸」，則寫石塔嶼孤立海島，漁舟停泊，坐釣於此。〈鼓山八景〉與打鼓港灣直接相關的其中一首：

海門清寥沲，輕棹欲杭之。月映鼇頭落，流分燕尾支。回帆搥聽鼓，潛壑容探驪。宵靜汲心迥，舟搖嶂勢馳。村光遙望渺，歸思度灣遲。唱罷金雞曉，伊人水一涯。<sup>32</sup>（〈雞嶼夜帆〉）

<sup>31</sup> 王瑛曾編，《重修鳳山縣志》，頁408。

<sup>32</sup>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頁472。

詩中景致怡人，雞心嶼的夜色，月映鼇頭，輕舟回帆，依據卓肇昌註文所言，雞心嶼位於打鼓門中，港灣曲折，兩旁峽峙，其中容一舟楫進出，「宵靜汲心迴，舟搖嶂勢馳」，海面上明月照映，波光潋潋，宵靜中舟船進入兩旁峽峙的打鼓門，疾駛入港，搖櫓響聲更顯清脆響亮。

卓肇昌此組〈鼓山八詠〉的焦點，由海中礁石轉向岸邊斜灣，另一首〈斜灣樵唱〉，書寫港灣美景，曲徑紆迴的斜仔灣邊，傳來遠處下山樵子的清唱，突顯打鼓港灣景象之適閒怡人：

忽聽樵子唱，躑躅下前山。幾田斜峰亂，一肩落日還。輕風聞遠浦，清響度花灣。嫋嫋鶯頻和，泠泠石點頑。行歌聊自適，笑士不如閒。試問家何處，白雲屋半間。<sup>33</sup>

斜仔灣位於打鼓山西南端山麓下，港灣邊美景如畫，「斜仔灣曲徑紆迴，石嵐松陰，樵人憩息，景絕幽折」<sup>34</sup>，遙望打鼓山斜峰亂，夕陽西下，樵夫清唱，貫穿了整個畫面，從山中下山，穿越田埂，乘輕舟渡過曲折花灣，餘音縈繞，閒逸清風。詩人寫出打鼓港灣樵人生活的自在閒適，也寫出此地人煙罕至，清幽淡雅的氛圍，少了俗世凡塵的氣味，多了自然山水的清新幽靜。相同的情景，卓肇昌另有〈鼓山賦〉細敘斜灣樵人恬淡的吟唱，：「斜灣花煖（作者註：山頂有斜灣，曲逕通幽），竹坑翠描（作者註：山拗綠竹坑竹甚茂）；往來朋牧，風雨呼樵。薜蘿人今古，泉林樂舜堯。午半薰噓，隔峰聞笛；巖陰臥畫，別塢吹簫。」<sup>35</sup>〈鼓山賦〉從鼓山八詠的景致鋪陳，細述立足於打鼓山所觀的港灣景象，再連結衍展出此地海洋圖像。

斜仔灣南面與旗後山相望，相對於打鼓山下清靜的港灣，旗後山的漁火點點，卓肇昌〈旂濱漁火〉書寫了港灣成為漁夫依靠停泊的歸鄉，漁夫於海中尋覓，

<sup>33</sup>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頁 472-473。

<sup>34</sup> 作者註文，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頁 472。

<sup>35</sup> 王瑛曾編，《重修鳳山縣志》，頁 492-493。

掙得生存物資後，夜幕西垂，旗後海濱漁火成為極美的裝飾，打鼓港灣南面的視野，點綴出熱鬧的景象：「旂濱沆寥夜，漁火滿沙洲。風渚熒熒亂，星船點點秋。疑珠鮫欲泣，高燭蜃為樓。二島輝珊樹，五花漾翠虬。光搖平野闊，影入大江流。客夢中宵永，殘燈古渡頭」<sup>36</sup>，旂後山舟楫停泊，漁家歷落，港灣引入漁人歸航，猶如伸展雙臂擁抱熒熒漁火進入的內延空間。

清治漢人形構的打鼓港灣意符，除了打鼓港駐兵防守的記敘之外，詩歌作品中多偏向自然海港的景觀書寫，對於此地的經濟活動，亦以漁人採捕的淡淡筆觸點畫之。藉此現象可知清治漢人對打鼓港灣投射的符號意義與其思惟模式相關：清人大陸型的思維型態，多半將打狗港視為山海共同形構的港灣，其上點點漁火進出，是個靜謐恬淡的漁港，但清人此觀點未能真正地發掘出打狗港的商貿潛能，將打狗港的海洋特質充份發揮，此情形直待日本統治者以資本主義者姿態開發經營才得改變。

除了作家文學所書寫的打狗港，清治時期漢人民間文學中的打狗港，亦是值得注目的另一個視角。大抵流傳於臺灣民間的林道乾傳說，故事是以明嘉靖年間（約十六世紀中葉）海盜林道乾在打狗山活動史實為背景，據史料記載林道乾為明嘉靖年間人士。到了日治時期李獻璋採擷當時臺灣民間故事而編成《臺灣民間文學集》，此集中有〈林道乾與十八攜籃〉的埋金傳說，應是清末臺灣民間擇取明朝人林道乾事蹟演變成為傳說故事，內容敘述海盜林道乾欲射箭以奪皇位，並在打狗山埋金的傳說故事，後因林道乾計謀失敗，欲從打狗山逃跑「道乾正急的無法可施，忽然奇想天開，拔起佩劍祝告天地，把它向打狗山縫處一劈，喝聲「開！」，轟然一聲，成為天然港門」，以劍劈山，開出打狗港門：

道乾正急的無法可施，忽然奇想天開，拔起佩劍祝告天地；把它向打狗山縫處一劈，喝聲「開！」，轟然一聲，成為天然港門。道乾的手中寶劍，應聲墜落海底去了。絕望中得到這一條生路，全軍大喜若狂。於是，從港

<sup>36</sup>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頁 473。

門遁往占城去了。<sup>37</sup>

在林道乾用力以劍劈山情形下，打狗港灣由是形成，是為漢人對打狗港地形的生成之想像式理解，這港灣符號的背後，反映著清末臺灣人民藉著林道乾海盜形象，表達官逼民反的社會現象。此外，傳說故事中的「埋金」情節，或然漢人的民間思惟，已對打狗港商業運輸貿易潛力有所認知，而這卻是清政府尚未能預知的。

#### 四、十九世紀末「現代化」打狗港的雛型

繼 1665 年荷蘭人完全退離打狗港之後，歐美文化再度於 1855 年，隨著美國商人進入打狗港，開啟了另一文化交會的視野。當時美商所投注打狗港埠的興建工作，將打狗地區建造成美國商人的居留地，是謂打狗港再度引入歐美現代文化的起步。

1855 年時，因臺灣的米糖出口及鴉片進口，美商羅賓奈洋行（W. M. Robinet & Co.）、奈伊兄弟洋行（Nye Brothers & Co.）與威廉士洋行（William M. Robinet & Co.）合購商船「科學號」（Science）。同年 6 月科學號船長波特（George A. Potter）與當時擔任分巡臺灣道的裕鐸簽訂貿易合約，合約內容包括賦予船長建倉庫貯貨的特權，並允許他將燈光號誌設在矗立入港處的旗杆上，與在沙灘邊設浮標。此項合約使美商取得臺灣外貿的獨占特許權，也使美商在打狗大事投資、建設港埠。合約簽訂後，科學號的船長改為魯尼（Matthew Rooney），將打狗港口四周的區域，劃為美國人的居留地，打狗哨頭一帶的面貌開始改變。為了開發這塊居留地而進行的工程，共花去四萬五千銀元，至 1857 年初才完成。工程內容包括一條深水溝，使港內沙洲上的海水流去，並在沙洲上建橋；又在入港的地方，築起了訊號臺，日間升起美國國旗，夜間懸燈，以便引導船隻出入；另外，

<sup>37</sup> 此篇傳說記錄者是「夜潮」，收於李獻璋編，《臺灣民間文學集》（臺北：臺灣新文學社，1936），頁 38-39。

還建造了一間容量一千噸的花崗石倉庫、兩棟住屋，和一座裝貨碼頭<sup>38</sup>。美商在打狗設立新式碼頭後，開始了販賣赤糖至中國華北的貿易活動，但仍屬小規模的商業交易，尚未帶起打狗地區大規模的經濟活力<sup>39</sup>。

美商率先在取得貿易特許權之後，美國外交代表進而有意謀取臺灣的治理權，引起英國決心將打狗列為向各國開放通商的港口，以免臺灣受任何一國控制。1857年3月16日英國駐香港總督包令函報英國外交部，建議讓臺灣貿易合法化，亦即臺灣共同對列強開放通商，同年4月20日，英國外交部將開埠列入修約目的之一<sup>40</sup>。1858年中國分別與美國、英國及法國簽訂「天津條約」，打狗正式開放通商，1864年打狗開設海關之後，更廣開歐美文化引進打狗港之門，此時打狗港「門」成為引入外來文化之門戶。

由於打狗的開港，英國長老教會首任駐臺宣教士馬雅各醫生(Dr.J.L Maxwel, 1836-1921)於1865年5月自廈門抵打狗港，展開十九世紀基督教在臺宣教之扉頁<sup>41</sup>。

打狗成為各國開放通商口岸之後，歐美各國的商行相繼來到此地開設洋行，進出口各樣的貿易物資，其中以赤糖為最，1868至1876年間，由打狗港出口的赤糖佔全臺輸出總值59.5%，使打狗港頓時躍居為全臺最重要的貿易港口，外商群集於此<sup>42</sup>。

當時除了宣教士及商業人士在打狗一帶活動之外，另外一位最為人稱道的是研究臺灣博物學者的史溫侯(Robert Swinhoe)。1864年8月至1866年2月間史溫侯居住打狗，其間史溫侯趁著任職打狗英國領事館之便，於打狗山進行臺灣動植調查鑑定工作，並撰寫臺灣的鳥類與哺乳動物等方面的論著<sup>43</sup>，開發打狗港

<sup>38</sup> 葉振輝，〈打狗軼聞〉，《高市文獻》(1991, 4: 1)，頁5-6。

<sup>39</sup> 洪啟文，《高雄港市聚落的形成、擴展與互動發展(1924—2004)》(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地學所博士論文，2007)，頁71。

<sup>40</sup> 葉振輝，〈打狗軼聞〉，頁8。

<sup>41</sup> 張守真、許一男，《高雄港紀事》(高雄：高雄市立文化中心管理處，1996)，頁26。

<sup>42</sup> 洪啟文，《高雄港市聚落的形成、擴展與互動發展(1924—2004)》，頁71。

<sup>43</sup> 張譽騰，〈英國博物學家史溫侯在臺灣的自然史調查經過及相關史料〉，《臺灣史研究》(1994, 1: 1)，頁132-142。

區生物科學之研究視域。

打狗港灣的美景亦令歐洲人士感到賞心悅目，直呼是上天賜予的禮物，英國長老教會牧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在《福爾摩沙素描》一書裡記載於 1872 年初從府城離開抵達打狗時所見的景象：

在打狗三哩之內，很快可以感覺到改變的好處。遠離平靜、悶熱的城市，光是看到壽山和瀉湖的美景，就像上天賜予的禮物一樣，陣陣清新涼爽的微風伴隨海洋而來...。<sup>44</sup>

自 1871 年至 1917 年止，在臺灣服事四十多年的甘為霖牧師，初到打狗的印象是：打狗港是一處得天獨厚的山海美地，怡人景致，加上涼爽微風足令甘為霖牧師忘卻府城塵囂。

繼續於 1873 年 10 月另一位來自美國的博物學家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搭船進入打狗港，並細敘進港時沿途所見的景觀：

傍晚時分，我們看見了打狗港的地標——猴山。我們的船隻繞著猴山而行，在進港時，小心翼翼地穿過兩旁都是岩石的窄小水道，最後在離岸幾碼處下錨。港內風平浪靜，好像池塘一般，港外卻是驚濤駭浪。.....。整座猴山幾乎是光禿一片，僅山腳下碼頭附近的兒石旁有幾棵樹，那裡有三、四間外國商人所蓋的小屋，更前面，則是一間用來儲存蔗糖的低矮倉庫。狹窄水道的另一邊，則是一塊粗糙的巨岩，看來是從猴山崩裂下來的，在巨岩之下，有一條寬度約兩、三百碼，綿延幾英里長的低矮沙岬，將港口和鄰接的瀉湖與大海相隔開來。在沙岬內側和水道入口附近，人口密集的漢人聚落了。漢人聚落前停泊了十五到二十艘戎克船，有一些捕魚用的

---

<sup>44</sup> 甘為霖（Rev. W. Campbell），許雅琦、陳珮馨譯，《福爾摩沙素描》（臺北：前衛出版社，2006），頁 12。

竹筏停放在沙灘上。<sup>45</sup>

在這段敘述裡，史蒂瑞看見了十多年前美國商人在打狗港邊所建造的小屋及倉庫，以及當時打狗港另一邊有低矮沙岬，沙岬上已有漢人的漁民聚落，而且是人口密集之地，應是指現今的高雄旗津。沙灘海邊有近二十艘戎克船，可能作為米糖等貨物載運之商業用途，另有捕漁用的竹筏。從文中可知，十九世紀後期的打狗，仍是以小型的商業與漁業功能為主。

自天津條約開放通商後，十九世紀後期的打狗港，多是歐美人士活躍於此地帶。與此同時的清朝官員，又是以什麼的立場居處於打狗港及其附近地方呢？

同治十三年（1874）清廷與日本之間「牡丹社事件」，是年5月日軍藉此事件為由登陸瑯嶠，駐兵結營，當時清廷有感於日軍之威脅，遂派沈葆楨來臺辦理海防事務，並修城築壘。據〈援臺紀略〉記載：

同治甲戌……於是南去鳳山三十里，進營東港，以援前駐枋寮臺軍，直刺桐腳倭營之衝。時當九月初旬矣。沈葆楨議以鳳山東港、枋寮以達瑯嶠，民番雜處，伏莽多憂，非勁兵宿將難資鎮撫，檄武毅右軍兩營馳往戍守，而全部駐鳳山者，時有旂後海口建築砲臺之役，以班從工。十二月，沈葆楨奏稱唐定奎統領銘武等軍十三營到臺，布置周密，紀律嚴明，倭氛斂戢，全臺為之一定。<sup>46</sup>

為防備日軍再對南臺灣之窺伺，沈葆楨在旗後與打鼓兩山對峙處建築砲臺，而後在《鳳山縣採訪冊》有相同的記載，指出打鼓山與旗後山上有兩個砲臺，一在臨港扼要處，一在大棚頂，可容駐兵一千名<sup>47</sup>。正當歐美人士趁著海關開放在打狗

<sup>45</sup> 史蒂瑞（Joseph Beal Streere）著，林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民》（臺北：前衛出版社，2009），頁35-36。

<sup>46</sup> 〈援臺紀略〉原收於《續修廬州府志》，此文係記清同治末年日兵侵臺沈葆楨奉命援臺及其後「撫番」之事。今收入《海濱大事紀》（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頁95-96。

<sup>47</sup>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頁34-35。又1916年5月間，福建省立甲種農業學校校長何鑽（系甫）寄贈給臺北圖書館一部「臺灣修學旅行報告書」：「打狗有砲臺二座，清光緒元年副將王福

港區熱絡經商、宣教之際，身為當時臺灣的統治者的滿清政府，則需建築砲臺，並投注於兵力，以防範另一外敵——日軍的侵略，十九世紀歐亞強國在東亞海域上活躍的經濟與軍事攻勢，致使清朝政府立足於臺灣，必須經常面對外患頻仍的侵擾。

無論清政府如何面對外患問題，十九世紀末打狗港已具國際商港的潛力，此時打狗港灣在繁複多元的族群文化與社會因素交織之下，隱然有著向上發展的動力蘊蓄其中，依據光緒二十年（1894）《鳳山縣採訪冊》記載當時打鼓港的景況：

打鼓港，在大竹里，縣西南十六里，源受丹鳳澳，西行，由港門（旂後、打鼓二山，左右對峙，相距七、八丈，若巨靈擘畫然，故曰：港門當中有雞心礁及港外各暗礁，皆舟行所宜謹慎者也）。通外海（浪平可泊輪船）出入（按此港潮之漲退，不過八尺，為他邑所無），內為通商口岸，華洋雜處，商賈雲集，經築砲臺，置戍守，洵臺南之門戶也。<sup>48</sup>

此時由旂後與打鼓兩山共同形成的打鼓港門，雖存在著暗礁的問題，並出現了打鼓港的商業運輸功能惡化的現象<sup>49</sup>，但先前已開放為通商港埠的打鼓港，實吸引華洋外商雲集，並為打狗港走向現代化預備了道路。

關於打狗港暗礁的問題，甘為霖牧師《福爾摩沙素描》，約於 1895 年的文稿，指出打狗港具有良港的天然優勢，唯再加以修建，必成為貿易商業的重要進出口港：

福爾摩沙最大的缺點是沒有良好的河港，因為適合航行的河流在少之又少。……相較之下，西南岸打狗的礁湖比較有可能成為福爾摩沙島上的貿

祿聘英國技師而建築者也。至頂，觀海濤洶湧；想錢塘八月怒潮，當不是過。旂山對面有打狗山，昔稱打鼓山」。此書現今編輯為《臺灣旅行記（一）》（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頁 37。

<sup>48</sup>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頁 63。

<sup>49</sup> 1877 年至 1895 年時打狗港的條件逐漸惡化，參見洪啟文，《高雄港市聚落的形成、擴展與互動發展（1924—2004）》，頁 71-72。

易進出口港。重要的是，它是比較完整的避風港，而且當地有非常豐富的珊瑚礁。只要將港口拓寬，再挖掉推積的泥沙，就能大量提供船隻停泊。最近胡思特（Consul Hurst）的報告中提到：打狗有一個天然的海港，大約七哩長，平均寬度約半哩，並且有一長型的珊瑚將礁湖與海隔開。要將這礁湖重整為一個完美的港口，……。<sup>50</sup>

打狗港自然天成的港灣地形，是海上作業船隻極佳的避風港，再加上豐富的珊瑚礁地質，資源豐富。只是，一直以來所存在著暗礁的問題，以致打狗多被定位為安平港的後備補給站。事實上，打狗港應是得天獨厚的優良港灣，包括：旗後與打狗間的港門，旗後沙洲的潟湖地形便於隻引進，但多處暗礁隨時危及船隻的安全。打狗港的整頓計畫，直至 1895 年日本政府統治臺灣後，才確實施行此港疏浚的重大工程，此工程是影響了打狗港日後步向國際港，也是打狗港市躍升為現代化城市的關鍵因素。

## 五、日本政府建造「打狗」為現代化港市

二十世紀日本對殖民地臺灣統治特質，乃是著重殖民地的工業化和生產力之發展，為實踐此統治策略，日本政府興起打狗港之建造計畫。明治三十二年（1899），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南巡打狗，認為有必要派員調查此港；後因基隆築港經費浩繁，同時支出，不無困難，遂暫終止。之後，明治三十七年（1904），鐵道部著手陸上之設備，同時調查臺灣南部適當之港灣。時值日俄戰終，臺灣糖業輸出愈增，事業繁盛，因應時勢之要求，興建打狗港更是勢在必行之政策。遂於明治四十一年（1908）決定興建，預定六年竣工，經費凡四百七十三萬三千元。著手興建後，未及一年，臺灣南部之產業異常發達，於大正二年（1913）起，為擴張工事，復追加預算費一千二百七十八萬四千元，以十二年竣工之延長計畫，

---

<sup>50</sup> 甘為霖（Rev. W. Campbell），《福爾摩沙素描》，頁 227-228。

兩旁築防波堤以禦風波，港內面積凡三十六萬坪。功成後，以每年可出入九十萬噸之主要貨物為標準，並可停泊重量萬噸以下之船舶十艘之設備<sup>51</sup>。

依據 1906 年 11 月 8 日《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日本政府計畫對打狗港施行疏浚填土工程計畫：

打狗一港，為本島南岸之要港。故縱貫鐵道之南終點，特置於此。其形勢自與基隆相類，為中南部之咽喉，貨物於茲吞吐。自此以北，約相距三十哩，雖有安平港，然該港當曾文溪注海之衝，港口常為土砂堆積，且海底遠淺，到底難以為良港，不如打狗港之有望。是以鐵道部視該港為重，注全力以經營，……。觀現今之狀況，埋立與浚渫，二者並行。蓋其埋立材料，則取海底之土砂，以浚渫汽艇，浚渫海底，其所取出土砂，則用以埋立，是為一舉兩得之法。然鐵道部之直接目的，為海面之埋立。一方擴張陸地面積，以完全陸上之設備；又一面浚渫海底，將來勿論小蒸汽船，即大型之帆船，亦得自由入港，是自後之積卸貨物，海陸連續，敏捷輕便，運輸大得便宜也。<sup>52</sup>

日本資本主義之實行，致使日治時的打狗港已躍居為臺灣南部之要港，原因是：一則因全灣縱貫鐵路興建工程的施行，另原因是安平港淤積嚴重，已不若打狗港運輸通達，遂使日本政府投注精神與財力，借由掏掘海沙來填土，一方面疏通海道，再方便利用填土擴張陸地面積，如是打狗港得以容納大小船隻自由進出，並有寬廣的陸地面積便於裝卸貨物，提昇了港口的運輸功能。再加上，打狗港周邊的鐵道、倉庫、停車場等交通設施，增強打狗港的轉運機能，促使打狗港發展為國際商港的的規模。

正當打狗港之營運日漸昌隆，此時書寫打狗港灣之文學作品，又呈現出什麼

<sup>51</sup> 張遵旭，《臺灣遊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88。又 1916 年 4 月當時代表福建省長來臺的張遵旭，旅行臺灣南北，寫下《臺灣遊記》，其中記載了打狗港築港之始末。

<sup>52</sup>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 11 月 8 日，第 2 版。

樣符號形態與意義呢？

日治時期臺灣三大詩社之一臺中「櫟社」，其創始人林朝崧（林癡仙），曾於 1907 年 9 月南遊打狗，其《無悶草堂詩存》中有二首關於此趟旅行所寫的作品：〈九日自臺南至打狗作 七言絕句〉記敘由臺南往打狗一路所見之景觀，另有〈旗後作〉則輕描淡寫地提及打狗港門夜潮來往，漁舟歸返的畫面：

小小旗山對鼓山，夜潮來往兩崖間。月斜人語菰蒲岸，知是漁舟港口還。<sup>53</sup>

旗後山與打鼓山相對之港門口，於此夜深月斜之際，人語聲伴隨著搖櫓聲，漁舟歸航的打狗港是恬靜怡人的。至 1908 年林朝崧另一作品〈打鼓港晚泛〉，同樣也是以夜晚泛舟觀景的旅遊心情來書寫，不同的是作者親身於舟船之中體味海上風情：

一江春水一帆風，兩岸樓臺夕照紅。欲喚桃根倚雙槳，樽前為我唱玲瓏。<sup>54</sup>

打狗港的美景再次成為旅行者聆賞海洋之美的最佳場域。自林朝崧詩中對打狗、鼓山及打鼓港的詞彙運用，可知介於晚清與日治初期的傳統文人，其對高雄的地名的採用，挾帶著新、舊文化交替的時代印記。

另位櫟社詩人傅錫祺約於 1909 年作〈打狗〉七言絕句二首，傅錫祺今昔的觀點觀望港灣之變遷：

舟船來往似飛梭，海水茫茫起白波。未得乘風橫渡去，中流空自扣舷歌。  
閉港謀卑不足論，漢家赤幟日翩翩。夕陽憑吊旗山壘，廢壁猶留舊彈痕。<sup>55</sup>

舟船往來穿梭於海面上，船過水痕，泛起白波，空中迴盪著漁人以槳擊節拍的叩舷歌，顯見漁人之悠遊自在。相對於現今漁人聚落的安祥和樂，此濱海的港灣，

<sup>53</sup> 林朝崧，《無悶草堂詩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卷 3，頁 87。

<sup>54</sup> 林朝崧，《無悶草堂詩存》，卷 3，頁 100。

<sup>55</sup> 傅錫祺，《鶴亭詩集·上冊》（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 17。

昔日曾是戰火頻仍之地，1874年「牡丹社事件」沈葆楨為此來臺辦理海防事務，修城築壘，以防外敵；但，同此時清政府也須面對著各國外商競逐打狗商港利潤的局面。詩人回想以前清季面對外患侵擾的情勢，與當下打狗港的場景，今昔對照，無不慨然。

與打狗港相鄰的打狗山，經常與海景連結為一體，這書寫手法複製了清治時打狗文學的意象，1908年吳祥東〈游打狗山次韻〉書寫山海相鄰的景象：

窮得仙源此地來，奇觀勝境自天開。幽崖徑曲通飛鳥，古樹陰濃護嫩苔。

列幟紅雲封海嶼，疑星白石降瑤夢。徘徊不覺情瀟灑，獨向長天自引杯。<sup>56</sup>

「奇觀勝境自天開」的打狗山，於奇勝天境之山中，曲徑幽崖，古樹濃陰。遠眺列嶼星佈海上，猶如天上仙物隕落，與天邊紅雲，相映成趣。如此遼闊視野中，瀟灑豪情油然而生。

相較於台中地區的傳統文人，在地高雄人鄭坤五參與第一波「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爭」的人士，並主張書寫台灣鄉土文學的傳統文人。一日，他夥同好友登上打鼓山，有作〈同少濤、太瘦生、琴鶴諸君子登打鼓山晚眺〉：

閑來小約吟詩侶，千仞峰頭話夕曛。眼底畏途雖九轉，終教移步到青雲。

飄然直上翠微巔，無數歸帆掛暮煙。極目家鄉何處是，海門西去水連天。<sup>57</sup>

友人相伴同遊登打鼓山，詩句隨著步移景換。後二聯則見作者將目光移向山外大海，歸帆掛暮煙，以「掛」字生動呈現出畫面的流動感，再以極目鄉關作結，留下言不盡意的餘韻。這首詩偏重於情景的抒寫，但鄭坤五另一首作品，則將日警緊盯的驚懼感貼映與畫家友人同上打狗山（即打鼓山）作畫的背景裡，此詩作並未公諸於世，僅見於鄭坤五未出版的別集中，詩題為〈余曾約太瘦生登打狗山作

<sup>56</sup>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明治四十一年（1908）7月21日，第1版。

<sup>57</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6181號，第3版〈南瀛詞壇〉，大正六年（1927）9月11日。

水彩畫乃驚動警官躡蹤以為暗射要塞地理圖也歸而詠此）：

閒雲野鶴世相容，何處名山不寄蹤。獨似無心波底月，時成鈎影怖魚龍。<sup>58</sup>

詩題裡的「太瘦生」，本名王坤泰（1892—1918），為鳳山郡九曲堂人，可謂與鄭坤五為同鄉友人。「太瘦生」自幼習傳統書畫，後曾東渡日本；其山水畫取法南宗文人畫系統，著重畫面取景及空間結構視覺經驗接近的畫法，筆力含蓄而敦厚，煙潤有致<sup>59</sup>。鄭坤五這首詩即寫於陪同這位畫家友人登上打狗山取景作畫，未料，途中兩人無顧遭受日警無端生疑，誤認兩人作畫乃欲取打狗港之要塞地圖。詩中間接地批判了在殖民時代裡，臺灣人民遭日人無端猜疑的景況。詩人面對日本統治下的壓力，乃持以閒雲野鶴、寄情山水，與時局共存的心態，但原本單純尋求繪畫藝境的無心之舉，卻也因日警的疑心，蒙上陰影。詩中印刻了日本統治時代下不自由的風氣，鄭坤五藉由打狗港灣事件的書寫側顯殖民政府統治下的時代氛圍。

誠如上述，在日本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化交疊施行的前提之下，臺灣總督府對打狗港施行現代化工程，提昇打狗港的國際港埠的競爭力，此舉卻也成為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所認同的功績。臺南出身的傳統文人胡南溟〈臺灣雜詠〉之一首：

打鼓山頭旭日紅，鐵輪百輛下屏東。北南二港開天府，海國車書頌大同。<sup>60</sup>

1904年縱貫鐵路選定打狗港為終點站，與北端起站基隆遙遙相對。鐵路屬於打狗港區的現代化工程周邊交通設施的增設，為當時古典詩作入詩的題材。胡南溟詩末以「北南二港開天府，海國車書頌大同」，表現出上述鄭坤五迥異的立場。

<sup>58</sup> 鄭坤五，〈友鶴山人鄭坤五未定草（一）〉，《《全臺詩》蒐集、整理、編輯、出版計畫第六年度期中報告書》（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6年），頁232。

<sup>59</sup> 黃冬富，〈日治時期臺灣東洋畫風之發展〉，收入國立台灣美術館「台灣美術丹露」主題網站，<http://taiwaneseart.ntmofa.gov.tw/page06.html>，2010年8月瀏覽，頁1-19。

<sup>60</sup> 盧嘉興，〈清末臺灣的詩文大家胡南溟〉，《臺灣研究彙集·第5輯》（臺北：古亭書屋），1968年3月25日。

隨著打狗港日漸現代化，打狗行政區域的劃分及命名，至日治中期有所變革。回顧清人領臺期間，曾因「打狗」二字甚俗，改以「打鼓港」取代來原有「打狗港」一詞，但至 1895 年後日本政府統治臺灣，「打狗」一詞，又再度被廣泛使用，筆者檢索《臺灣日日新報（1896—1944）資料庫》，以「打狗」及「打鼓」為關鍵字搜尋的結果，「打狗」的資料條目總數為 1644 筆，相較「打鼓」的 618 筆，多出一千多筆，顯見日治時期人們又恢復以「打狗」指稱現今「高雄」的用法。大正九年（1920）日本對全臺灣施行地方新制，影響所及，是年 7 月日本統治者，原「打狗」舊名，取 Takao 日語的諧音改寫為「高雄」，設高雄州<sup>61</sup>。嘉義地區傳統文人賴惠川以竹枝詞的形式，寫出 1920 年打狗地名一換為高雄的史事：

高雄咫尺地相通，傳說紛紛大不同。自昔高雄稱打鼓，却將打狗字高雄。<sup>62</sup>

打狗與阿猴的地名，自此地方新制頒佈後，遂成歷史名詞。高雄地名，一路自打狗、打鼓，乃至更換為高雄，賴惠川精要地道出高雄地名變遷的歷史。

1920 年 10 月《臺灣時報》刊載了百首漢詩，題為〈臺灣新制頌〉，乃是集合了全臺各地日、臺漢詩人的作品。其中一位作者李冰壺，引用新制地名「高雄」二字入詩：

北斗七星耀海東，南山打鼓峙高雄。屯時極處亨時到，武在鎬京文在豐。  
新作舊邦功必倍，今殊古制勢難同。臺灣自治歸淳厚，一片頌聲達帝聰。<sup>63</sup>

打鼓山峙立於高雄，詩中宣告臺灣地方自治制度新時代已來臨，認為這是高雄將步向現代化港市亨通發展的時機。然而，比較當時代知識份子的觀點，李冰壺在

<sup>61</sup> 「高雄州」之設立，為日本對臺灣地方的改制創舉，1920 年 7 月 18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7 版，以「臺灣統治上新紀元」標題向時人宣告。

<sup>62</sup> 賴惠川，《問紅小草》（嘉義：作者自印本，1951），頁 43。

<sup>63</sup> 《臺灣時報》，1920 年 10 月 1 日，第 16 期，頁 129。

此詩所反映的「自治制度」，放諸該時代的社會脈絡裡，知識份子如林呈祿、葉榮鐘反倒認為這是殖民統治者乃是假自治之名，行內地延主義之實的作法。因 1920 年的行政改制，未非真正落實如同歐美立憲政治的民眾輿論自覺，重視國民參權的「自治制度」<sup>64</sup>。此觀點可與李冰壺詩作的想法相互參照。

## 六、結語

本文旨在追溯 1920 年前，尚未進入完全現代化港市的打狗港，如何經歷不同政權的統治，及各種族群所挾帶社會文化概念，以形塑出「打狗」港灣符號的意義層次。

檢視打狗港灣符號的生成與衍變，從 Takao、打狗、打鼓到高雄一路的變化，層層疊映各族群的文化，亦使打狗地區的文化脈絡，烙印了各種文化存在。它不是「中心化」的思維，而是具有層級差異的理路，先是馬卡道族以「Takao」語音表示此地多有「竹林」之意。1624 年以後荷蘭人採用「Tancoia」「Tancoya」、 「Taccauja」等拼音文字，亦是以音響與形象連結此地方名稱的概念於是，符號任意性累積「打狗」符號的意義層，先是具「港灣」的地理形象概念，加上對打狗港準確丈量地形的科學思惟，及其商業稅制的施行，加諸海洋貿易意識於轉運站「打狗」的港灣，先是以記音的文字承載符號的意義，再形象性的符號，表徵了打狗港灣的地理概念與地形特徵，荷蘭人漸次賦予打狗港灣了社會經濟物資的各種符號意義，約定而俗成，十七世紀的「打狗」港灣便成為現今高雄港灣的最早名稱。

1661 年鄭成功從荷蘭人的手中取得統治權，漢人政權取代荷蘭人，進入明鄭治臺的時期，政治中心在府城（今臺南），打狗港則屬於漁港，兼具軍備要地。明鄭治臺的階段，打狗港區為重要軍屯地區，軍事意義是為明鄭時期對打狗港的

---

<sup>64</sup> 陳翠蓮，〈抵抗與屈從之外：以日治時期自治主義路線為主的探討〉，《政治科學論叢》（2003，18），頁 146-148。

符號概念。

打狗港灣符號的書寫，進入清治臺灣的階段已有所改變。漢人初至高雄，以記音方式採用「打狗」一詞，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首部《鳳山縣志》稱打鼓仔港，康熙六十年（1721）黃叔瓚，在《臺海使槎錄·赤嵌筆談》亦稱為「打鼓」，自此以後，清治臺灣文獻中，多用「打鼓」指稱今日的高雄。再者，清治時期文學作品中對於打鼓港灣的書寫，除了視為派兵駐守的海防重點外，亦多連結於打鼓港、打鼓山相互輝映的海景，以抽象思惟書寫此地的景觀氛圍，但未若海洋經驗豐富的荷蘭人注目於打狗港的商港功能，僅保存著小規模的漁港型態。

直至 1855 年，美國商人進入打狗港，展開現代港埠建設的序幕，美商人居住此地為打狗港引進歐美進步而現代的文化。1858 年打狗正式開放通商，1864 年打狗開設海關之後，更廣開歐美文化引進打狗港之門，此時打狗港「門」成為廣引外來文化之門戶，當時有宣教士、外商人士及博物學家來臺，開展出歐美文化與臺灣文化交會的視域。同此時歐美人士預見了此港的貿易潛力，甘為霖牧師《福爾摩沙素描》，約於 1895 年所寫文稿中，指出打狗港具有良港的天然優勢，唯再加以修建，必成為貿易商業的重要進出口港。綜觀 1858 年開放通商後的打狗港，美式的建築風格及港埠雛形，與當時漢人漁村的恬靜型態，兩種差異對比的文化層次，併置於打狗地區，文化視域的「衍異」成為此地相當特別的景觀現象。

1895 年日本治臺以後，日本政府持著資本主義的經營理念，始於 1908 年挹注人力與財力，費時十二年建造打狗為現代化的港市，大展魄力地施行築港工程、整體性都市建造計畫，及港埠周邊的建設，真正實現打狗港邁向國際貿易商港的理想之路。打狗港灣意符遂從早期的停泊補給站、魚稅檢查哨、軍防要地、山海景點，而在二十世紀初真實地蛻變為南臺灣的第一大港。

從本文逆溯性的探究可知，高雄港的國際特性遠在十七世紀展開，歷經各樣文化元素的層層吸納與汰除，締造了現今高雄港的格局及其於東亞海運的關鍵地位。

## 參考文獻

### 1、專書

- 沈有容，《閩海贈言》，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 朱仕玠，《小琉球漫誌》，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 蔣毓英著，黃美娥點校，《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
- 李丕煜主修，詹雅能點校，《鳳山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
- 劉良璧纂輯，楊永彬點校，《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
-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臺北：宗青圖書公司，1995。
-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海濱大事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2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
- 《臺灣旅行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21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
- 張遵旭，《臺灣遊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8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林朝崧，《無悶草堂詩存》，臺灣文獻叢刊第 7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傅錫祺，《鶴亭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 賴惠川，《悶紅小草》，嘉義：作者自印本，1951。
- 李獻璋編，《臺灣民間文學集》，臺北：臺灣新文學社，1936。
-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
- 施懿琳等主持，《〈全臺詩〉蒐集、整理、編輯、出版計畫第六年度期中報告書》，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6 年。
-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地圖·上冊》，臺北：漢聲雜誌社，1997。
- 張守真、許一男。《高雄港紀事》，高雄：高雄市立文化中心管理處，1996。
- 伊能嘉矩著，江慶林等譯，《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上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1991。
- 江樹生譯註，《荷蘭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1）》，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7。
-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記·第 1 冊》，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02。
-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記·第 2 冊》，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02。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記·第3冊》，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03。

甘為霖（Rev. W. Campbell），許雅琦、陳珮馨譯，《福爾摩沙素描》，臺北：前衛出版社，2006。

索緒爾（Fedana de Saussure）著，高名凱譯，《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史蒂瑞（Joseph Beal Streere）著，林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民》。臺北：前衛出版社，2009。

## 2、論文

### (1)期刊論文

盧嘉興，〈清末臺灣的詩文大家胡南溟〉，《臺灣研究彙集·第五輯》，臺北：古亭書屋，1968。

中村孝志著，江燦騰譯，〈台灣南部鯔魚業再論〉，《台灣風物》36卷3期（臺北：1986），頁57-71。

張守真，〈明鄭時期打狗史事初探〉，《高雄文獻》32、33期合刊（高雄：1988），1-19。

葉振輝，〈打狗軼聞〉，《高市文獻》4卷1期（高雄：1991），1-17。

張譽騰，〈英國博物學家史溫侯在臺灣的自然史調查經過及相關史料〉，《臺灣史研究》1卷1期（臺北：1991），頁132-151。

陳翠蓮，〈抵抗與屈從之外：以日治時期自治主義路線為主的探討〉，《政治科學論叢》（2003，18），頁141—170。

### (2)碩博士論文

吳雅芳，《打狗港與旗後的發展（1624-1920）》，臺南：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洪啟文，《高雄港市聚落的形成、擴展與互動發展（1924—2004）》，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地學所博士論文，2007。

## 3、報紙

《臺灣日日新報（1896—1945）清晰電子版》，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05—1911）全文電子版》，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日治時期臺灣時報資料庫（1898—1945 合集）》，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

黃冬富，〈日治時期臺灣東洋畫風之發展〉，國立台灣美術館「台灣美術丹露」

〈<http://taiwaneseart.ntmofa.gov.tw/page06.html>〉，2010年8月瀏覽。

